

追忆刘乃中先生

■张瑞田

1

10月2日晨,即将远行时,到书房找到一本想读的书带着,经过房门时,不经意停下脚步,抬眼看着房门左侧悬挂的一件诗札——“惯于洗面见嘉宾,乱发蓬头赧报人。出水芙蓉无矫饰,孰云汗垢反天真。旧作一首偶录博采。辛卯腊月刘乃中九十”。我轻轻把这首诗读了一遍,然后锁门,驱车往张家口度假。

刘乃中的行草诗书札,写在八开的笺纸上,粉色的笺纸套印淡绿色的梅花,疏朗的字迹,两枚大小适中的印章,让这件诗札颇具文人气息和审美魅力。

这件诗札在我的书房悬挂两年多的时间了,刘乃中先生的书法和诗,成为我与他的情感联系,也是我学习书法与诗歌的无形督促。辛卯年,也就是2011年,我正推动“心迹·墨痕:当代作家·学者手札展”的巡展工作,趁回吉林的机会,我去位于松花江边的“无门限斋”拜访刘乃中先生,并请他写一页诗札支持我的工作。刘先生爽快答应了,提笔便写,还向我传授了许多手札的常识。

是感应,还是暗示,10月2日这一天在刘乃中先生的墨迹前伫立,诵读诗篇,遥想旧年岁月,感慨时间倥偬。

十月长假的道路不顺畅,在车里听马勒《第四交响曲》。微信轻柔的声响引起我的注意,一行冷冰冰的字进入眼帘: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学者刘乃中先生10月1日晚逝世,享年94岁。

我关掉了汽车音响,又看了一遍讣告,驶往张家口的车轮变得沉重了。

应该说,刘乃中先生不是当今文艺学界的显赫人物,也不是居于高位的意见领袖,可是,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他的学养、人格,他笑傲人生的姿态,恰恰是文艺学界最缺少的。

2

2011年,刘乃中先生九十岁。这一年,有关部门为他举办了一系列

的庆祝活动,其中有刘乃中艺术馆开馆暨《刘乃中艺术从胜》的发行。《刘乃中艺术从胜》共计八册,有书法篆刻集、诗文集、手札集、友朋手札、书画集、传记集等,涵盖了刘乃中先生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浓缩了刘乃中从北京到吉林的曲折人生。对刘乃中先生,我有一些了解。二十年前,我应某杂志社之约,对刘乃中先生做了深入的采访,撰写了数千字的访谈文章。刘乃中与夫人孙贤舒似乎记得那篇文章,当《刘乃中艺术从胜·履迹》讨论大纲时,他们邀请我参与,担任其中部分章节的写作任务。我提出,对刘乃中在北京生活、工作,以及被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的经历有兴趣,我愿意写这一时期的刘乃中。编辑组和刘乃中本人同意了请求。

我为什么对这一时期的刘乃中有研究的欲望呢,因为羽扇纶巾的刘乃中在辅仁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还为北平解放做出过贡献,本来有着快乐的工作岗位,有着美好的现实生活,却因言获罪,带着满腹的学问和高操的才艺,被遣送寒冷的北大荒,艰难面对非人的生活。

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政治环境的评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刘乃中也不例外。彼时,刘乃中在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工作,担任科长职务。忆及打成右派的因由时,刘乃中苦涩地讲道:“党号召大家提意见,我其实非常慎重,只要求在极小的范围(4个人),以谈心的方式提一点意见。首先我表明自己不赞成搞运动,很多运动尤其是初级阶段,总是唯物不足唯心有余。另外,我对某些没有文化知识的老革命的瞎指挥也十分不满,不少老革命只是由于资格老,打仗勇敢而当上领导干部,然而不学无术。为了体现对老革命的尊重,我主张建立‘年资津贴’,而避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就是右派言论,这就是发往北大荒监督劳动的理由。令人痛心的是,与此同时,他的大哥刘乃隆,弟弟刘乃元,一并被划为右派。刘乃隆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时任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刘乃元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系新华社翻译。三兄弟均

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才华,有思想,在他们最能展示才华的时候,被归入另类。最痛苦的莫过于父亲,他非常恼火,虽然了解也理解自己的儿子,但,无法理解儿子的遭遇,无法理解那个年代。刘乃中安慰父亲,历史可以证明,犯错误的不是我们,右派本身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刘乃中依然幽默,他对父亲说:刻一块“三右堂”的牌匾挂在家里吧。父亲当然不会同意,不过,无形的“三右堂”牌匾挂在了刘乃中的心头。

1982年,剧作家、也是赫赫有名的右派吴祖光到吉林市讲学,我前往聆听。我曾有剧作家的梦,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是我喜爱的话剧剧本,因此,对吴祖光很是崇拜。在吉林市电影公司礼堂,吴祖光在一些人的陪同下步入讲台,开始讲述自己的创作经历。我发现,陪同人员中有刘乃中先生。此时的刘乃中是吉林市图书馆副馆长,是著名书法家、篆刻家,与赵玉振、那致中、金意庵诸先生并称“江城四老”。吴祖光到吉林市,他是陪同者之一,何因何故,我说不清楚。是吴祖光道出了原委。他说,他与刘乃中一同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是难兄难弟。我的心一怔,在我看来,书法家、篆刻家闲适优雅,惯于中庸之道,不会“惹事生非”的。没有想到,温文尔雅,海人不倦的刘乃中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苦难。这一年的这一天,刘乃中的背影在我的眼睛里有了特别的质感。

3

1995年,刘乃中接受了我的采访。1958年3月,刘乃中与中央直属机关的右派们乘“专列”离开北京。临行前,他清点自己的藏书、印谱、碑帖,把剃刀、砚台、毛笔、石章一一存好,他相信不久就会回来。“专列”在黑龙江山站停下,刘乃中跳下火车,宛如跳入一个冰窖,肆意的寒风粗暴地袭来。吃过晚饭,又扛着行李,爬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继续前行。四眼望去,皆是皑皑白雪,有时,汽车在雪墙两侧行驶,萧瑟的感觉油

然而生。天亮起来,颠簸、寒冷的冬日夜行结束,当看到目的地的“住房”,刘乃中目瞪口呆了。“住房”就是马架子,他向我详细描述了马架子的形状:“所谓马架子,就是一排人字形松树杆子,用几个横杆子绑上,上面搭起草,就形成一个人字形的立体的草‘屋’。‘屋’的两头挂个草席,各留一个门,既是出人的门,也遮挡视线,对面两排‘床铺’铺上褥毡,上面是一层黄豆皮,再铺上各自的被褥,人就睡在上面。头冲外,脚从内。同来的一百多名中央机关的‘右派’,都挤在一个大棚中。”

这是黑龙江省宝清县853农场二分场。在这里,刘乃中生活、劳动了两年零八个月。1960年,中央规定,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右派们再分配到全国各地继续改造。刘乃中接到了去吉林省长春报到的通知。1961年1月,他到吉林市文化局报到,旋即分配到吉林市图书馆工作。当然,在吉林市图书馆工作,再苦再累,也比北大荒的生活好多了。虽然在吉林市图书馆依旧是接受改造的右派,依旧干着又苦又累的体力活,但毕竟内心与精神有了喘息的机会。没想到随后是文革,他又跌入现实的低谷,忍受人生的磨难。

直到拨乱反正,直到改革开放,他被平反,生命的春天得以到来。很快,他担任了吉林市图书馆副馆长,很快,他的书法、篆刻参加了若干次全国重要展览,很快,他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西泠印社,又被选为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开始临帖习字。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刘乃中的书法和篆刻。

赵朴初对刘乃中的书法篆刻评价极高。他不仅推荐刘乃中加入西泠印社,还请他为自己治印。1993年1月18日,赵朴初在致刘乃中和孙贤舒的手札中说:“……兹托牛克强同志返吉之便,带上石章三方,其一拟求赐篆此诗末句,即:讴歌期见五洲同。另一拟刻‘少病少恼’四字,圆章乞刻一‘开’字,未知能蒙见许否?无厌之求,惶恐,惶恐!请于闲暇时为



刘乃中

之,不敢过分干扰清神耳。”1995年,刘乃中为赵朴初刻“居有竹”,赵朴初看到后甚为高兴,附呈一词奉酬——“乃中先生为余刻一小印,文曰‘居有竹’。戏作小词为报。调寄《忆江南》,敬希雅正。居有竹,不止两三杆。缩有东篱陶令宅,愧无数亩子山园。聊藉一枝安。”庚信《小园赋》:三竿两杆之竹”。乙亥季夏。朴初未定稿。”

启功先生是刘乃中辅仁大学时的老师,师生之间情深似海,他不仅赠予刘乃中二十余幅书画作品,还亲自为刘乃中题写斋号,并作诗《题〈刘乃中先生书法篆刻集〉》,积极评价刘乃中的书法、篆刻创作——“铁笔追秦汉,柔毫继晋唐。古华艺古,千载见遗芳。戊寅秋日拜观汉宽先生此册备见学养之邃,功力之深。敬括里句以志钦佩,即希印可。启功具草,时年八十八又六,病目未廖,书不成字。”

4

采访刘乃中,自然要把文章请他寓目。刘乃中先生如中学老师一样认真,从错别字,到标点符号,一一订正。十年前,我写给他一通手札,先生回复时,也没有忘记把不准确的语词标识出来,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走进无门限斋》的文章,把先生改错字的事记录下来。现在写文章,非常注意那些容易出错的文辞,心有狐疑,就翻词典,避免以讹传讹。这是刘乃中先生对我的影响。

书画界有陋习,一是热衷血统论,一是讲究拜名师。刘乃中在上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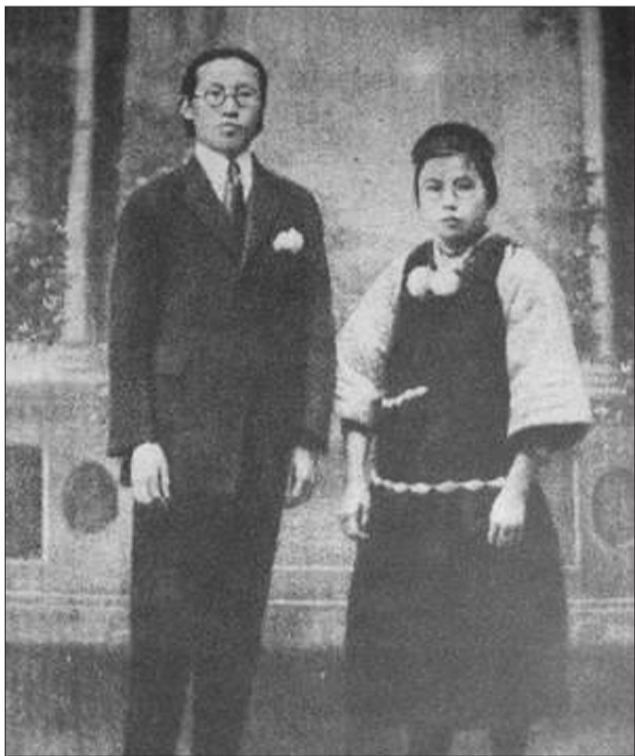
纪40年代初于上海拜访了篆刻名家王福庵,后来,坊间传说,刘乃中是王福庵的弟子。听到这样的传说,刘乃中没有沉默,郑重纠正,他说:“最为遗憾的是,那时我没再连续多去几次。遇见大师了,却没有让大师亲授我刀法、篆法,没有得到大师直接的点拨,没有正式拜他为师——当时也不知道拜师怎么拜啊!好处呢,就是我在篆刻上只受他的影响,没受他指授,没有完全走他的路子。王福庵刻的印工细、秀美。看到他刻的印,我就知道,自己刻印虽然是摸索出来的,但因果来路正基本还是‘入门合辙’的。”

王福庵早已经不在了,没有人知道刘乃中是否拜他为师。如果刘乃中愿意以师礼自居,将计就计,自己就成了名师之徒了,声望、润料似乎会高起来。刘乃中没有这样做,也看不起这样做的人,在他记忆力没有衰退的时候,把自己与王福庵简单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

毕竟在吉林市生活了三十年,对那片热土感情丰满。应该说,刘乃中先生对吉林市和吉林省的书法篆刻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松花江畔成长起来的书法篆刻家群,就是证明。与书法界的朋友聊起刘乃中,他们说,刘乃中先生书法篆刻的路子正,读书多,与启功等大师关系密切,对吉林市的书法发展贡献巨大。人人都这么说,自然有道理。不过,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刘乃中的现代人格,现代思想,对传统典籍的常识性理解,对苦难的体察,以及是非之心,洞察历史与未来的眼光,更值得我们了解和研究。

朱湘三题

■眉睫



朱湘与妻子刘景君

朱湘身后事

朱湘是上世纪20年代与闻一多、徐志摩相比肩的大诗人之一,但他的凄惨身世令人扼腕。他的一生是与残酷现实作斗争的一生,也是被现实无情打击和最终被抛弃的一生。他的身世具有传奇色彩,死后更成为一个难解的“谜”。他生前“结仇”很多,与他强烈的自尊心和敏感多疑的性格不无关系;而他又偏偏生活在多灾多难世态炎凉的旧中国。他的悲剧性格和世俗社会,像无形的枷锁将他送上死亡之途。但在他周围却又形成一个小小的文学圈子,成员有罗念生、罗德岚、柳无忌、赵景深、徐霞村等。朱湘与他们肝胆相照,情同手足,这就不能不令人费解。这是朱湘性格复杂一面的表现。当他与妻子不合,在安徽大学又不顺心之时,是他的人生下坡路。而他离开安徽,则是必然踏上绝境。一个自负的神经质病者,处处受阻,处处怀疑,最终诗神离他而去,在遭受物质与精神双重打击的情况下,诗人蹈江而去。朱湘之死,成为现代文学

史上的沉痛一页。

最近读到石定乐、万龙生二位先生关于朱湘的文章(原载《书屋》2005年第一、第七期),更发觉世人对朱湘身世和身后事不够了解。其实,朱湘的身世及其身后事经罗念生、柳无忌、赵景深、朱小沅等人的回忆和调查已经弄清楚了,只是资料分散不易查找而已。柳无忌曾将罗念生、赵景深、朱小沅等人的回忆与调查做了番整理,写成长篇“文讯”《晨雾暗笼着长江——朱湘的遗著与遗孤》,对朱湘作品出版和研究情况以及朱湘子孙后辈生活状况进行很详细的概括。该文连载于1989年4月26、27日的台湾《联合报副刊》,已经收入新近出版的《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一书。这里不妨将罗念生、柳无忌等人的文章稍作摘录:

朱湘死后,传闻竟君在长沙进了尼姑庵,小沅被送入南京的贫儿院……抗战时竟君携儿女去蜀,小沅于四川某高中毕业,在一个小县的村学教书,难以糊口。(柳无忌:《晨雾暗笼着长江——朱湘的遗著与遗孤》)

小沅后来到处流浪,一多曾叫他到昆明去投考西南联大,可是小沅到达时,一多已被刺。小沅果然考上了西南联大,但是他母亲不让他学文学。他在云南大学经济系读过书。他后来因为历史问题,被送到煤矿劳教二十年,已于1978年死于职业病——矽肺病。家里的人最近才得到有关单位的通知,说已于1979年5月为朱海士(小沅)平反。朱湘的孙子佑林患红斑性狼疮,一种白血病,三年痛苦,已于本月18日去世。朱湘的女儿小东的情况也很艰苦……竟君已于1974年去世,丧葬维艰。(罗念生:《忆诗人朱湘》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大约1990年)雅致饭店门口的大街上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妈在卖短裤,她是现代诗人朱湘的女儿朱小东。朱小东有一条腿已经不在,她给我们看她的假腿,是木头的。有一天,我们一帮诗人跟着她到家里去看朱湘年轻时的照片和书信。看过后,我们都认为她爸爸长得很帅。朱小东的脾气跟她爸一样,她仍坚持学系的一个女生到饭店来勤工助学,把堂里的垃圾扫了堆在她的推子下,她大发雷霆,两个人吵了起来。(朱晋华:《昆明文学青年的老巢:莲花池》原载《青年与社会》2004年第11期)

念生在长沙找不到竟君削发为尼的尼姑庵,朱湘的后人亦未提及此事,诸系传说无凭……朱湘后代惟一的希望寄托于小沅的长子朱细林与细林的男孩永湘(小沅在世时为他取的名字)身上……在艰苦的环境下,细林仍坚持自学,酷爱文学,喜读泰戈尔、雪莱、波特莱尔等人的作品,有志能兼父为诗人。他曾用朱海士(小沅)祖父、朱细林笔名的创作形式,撰写了七万

字的《诗人朱湘之死》长文,其中三万字曾在香港的杂志分期登载(1984)。(柳无忌:《晨雾暗笼着长江——朱湘的遗著与遗孤》)

柳无忌的长文,还将朱湘先辈、曾孙辈的艰难生活公之于世,表示孤愤和痛心——朱湘的后人重演着他的悲剧!他们在昆明均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甚至超过了朱湘当年的凄惨遭遇。该文详细纪录了朱湘的身后事,包括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活、工作、丧葬等诸多方面,并附录了朱细林的《写在〈诗人朱湘之死〉前面》的前三段。

可以说,朱湘“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和他十分感人的爱国精神”已经越来越为世人所了解,“朱湘诗学”也开始受到关注并被揭开,“朱湘”这个哑谜开始被揭开。

朱湘未死?

朱湘投江后,有关于“朱湘未死”的说法。朱湘生前好友徐霞村的女儿徐小玉在《关于(我所认识的朱湘)》中说:“朱(湘)投江的那艘吉和轮船打桨多时,却没找到尸体,而朱湘又是个会游泳的人。我虽然不信有鬼的存在,但这样一个和朱湘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的出现却使我像触了电似地愣住了。我虽然不信有鬼的存在,但这样一个和朱湘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的出现却使我像触了电似地愣住了。过了几天我把这次的‘奇遇’告诉给刚刚回国不久的罗念生兄,他也说自己在东安市场

也有过这么一次‘奇遇’,他也同样没法解释。”(徐小玉所引源自徐霞村:《我所认识的朱湘》)。

不过徐霞村又说:对朱湘的死“从感情上不愿意相信在亲人或至友逝去后,一个人往往觉得死者依然还在身边。这是常有的事”。徐霞村是传出“朱湘未死”的第一人,并拉罗念生做保证,可是他立即否认了自己的“猜想”和“奇遇”。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徐小玉说:“1990年,我突然收到一封朱湘之子朱小东从昆明寄来的信问朱湘当年投江后并未死,问我是否知道这方面情况?”文中竟将朱小东误为“朱湘之子”,显得极不可信,而且也应是“凉系传说无凭”。徐霞村的“朱湘未死”曾引起研究界的注意,而徐小玉欲进一步推波助澜,其实徐霞村的“心虚”,已经否认了这一点。现在是应该向世人澄清这一事实的。

朱湘研究亟待加强

作为一个诗人,朱湘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这是中国新诗界的骄傲。作为一个散文家,他的散文情感真挚、旖旎动人,打动了多少赤子之心,尤其是他的书信集《海外寄君》,与徐志摩的《爱君小札》、鲁迅的《两地书》、沈从文的《湘行书简》并称为“民国四大情书”。作为一个翻译家,被誉为翻译天才,至今仍由出版社出版他的翻译作品。

朱湘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朱湘生前好友罗念生、罗德岚、柳无忌、赵景深、徐霞村以及同时代其他作家对朱湘进行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以后来结集出版的《二罗一柳忆朱湘》为代表,就朱湘的生平、主要作品等进行了印象式评述。二是以钱光培、王玉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朱湘研究者,

他们大都直接接触到了朱湘的生前好友,这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他们也站在现代文学研究的高度,以发展现代文学学科、拓展现代文学史料为目的,真正地开启了朱湘研究,其成果以1987年出版的、钱光培所著《现代诗人朱湘研究》为代表。此书是朱湘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仍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据钱老告诉我,他在八十年代初研究朱湘的时候,当时的现代文学史教材里还未出现朱湘的名字。三是以孙基林、刘志瑾、张旭、张邦卫、谷峰、余世磊等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从朱湘生平、朱湘散文、朱湘诗歌、朱湘译诗、朱湘诗学等多个角度,较为深入地展开了研究,其主要成果有孙基林《漂泊的生命·朱湘》(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刘志瑾《纯粹的诗人:朱湘》(台湾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版)、张旭《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邦卫《朱湘论稿》等。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朱湘研究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一是“朱湘研究并不算多”,至今为止,朱湘研究专著屈指可数,还不够全面深入,不够细致,譬如目前就尚未有令人满意的《朱湘传》或《朱湘评传》。二是朱湘作品大量重复出版,除陈子善老师所编《孤高的性情——朱湘书信集》等书以外,鲜见体现编者用心搜集,有学术含量的文集出现;同时,《朱湘全集》至今也未问世。《朱湘全集》不得问世,直接影响了朱湘研究要想得到深入开展,其重中之重即是出版《朱湘全集》。除了尽快推动《朱湘全集》的出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修缮朱湘故居、创建朱湘纪念馆,全面系统收藏朱湘资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